

編寫“亡國”歷史記憶

——徐鉉《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之
興亡敘事與李煜論定

張鑫誠

【摘要】本文以墓志銘為媒介，期以探析趙宋官方對待降君之態度，透視南唐降臣入宋後的處境與心態，進而側觀趙宋君臣如何回憶並編寫征服南唐的歷史記憶，以及如何詮釋被征服者的政治地位。本文鉤沉徐鉉受宋太宗命為李煜撰墓志銘背後複雜緊張的政治背景，發現徐鉉在把握趙宋官方統一南唐的立場時，也存故主之義，使之同時具有特殊的文學與史學價值。徐鉉構建南唐國亡乃天命所歸的敘事模式，既淡化李煜亡國之君責任，又尊奉揄揚了趙宋承天受命的正統性。徐鉉還粉飾歷史情境中趙宋侵略的主動性，同時還將國覆責任推之於離間趙宋、南唐關係的吳越。而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的趙宋所併，也源於太宗朝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徐鉉在對李煜形象與功業進行蓋棺論定時，突顯李煜對內以古道馭民施行仁政，對外謹藩國之度；藉之促使降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實。徐鉉繼承“燕許”碑取實錄的寫作要旨，客觀指出李煜治國時的弊端，也隱含反省規箴之意。在銘文中以騷體描述李煜既葬勒銘的過程，以典奧淒婉之風抒發哀悼；且運散入駢，顯出雄辭逸氣。徐鉉實對北宋文壇具深遠影響，以該文為取徑重新審視徐鉉駢文價值，明晰北宋廟堂文章倡古道、守法度、重氣格的文學風尚實有源自宋初徐鉉之跡。

【關鍵詞】李煜 徐鉉 南唐 墓志銘 宋代駢文

一、前言

太平興國三年(978)七月壬辰,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937—978)卒,追封吳王^①。徐鉉(916—991)現存《騎省集》中,收《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一篇(以下簡稱《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墓主即是李煜。關於這篇墓志銘的寫作背景,魏泰《東軒筆錄》之記載最爲人所樂道: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②

通過了解歷史情境中徐鉉的南唐降臣身份^③,結合魏泰之記載,我們已然可以想見,徐鉉受命爲故主寫作墓志銘的尷尬處境與寫作難度:太宗讚賞徐鉉忠義的同時,何嘗不會懷疑徐鉉是否仍心念故國。考之史傳,徐鉉在南唐危亡之際諸多忠義之舉,如在趙宋陳兵壓境時,能不以自身安危爲念,與宋太祖激烈辯論^④而在國亡入北時,面對宋太祖的責難,也正色不畏死亡保持江南大臣的氣節^⑤。也正因如此,太宗對徐鉉及其後學始終保持距離,內

① (元)脫脫等《太宗本紀》,《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卷四,第59頁。

② (宋)魏泰撰,燕永成整理《東軒筆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卷一,第211頁。現徐鉉集中所載的是《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並非神道碑。

③ 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南唐去國號“唐”,自稱江南,以表臣服。爲免混淆,本文仍以“南唐”指稱李煜與徐鉉的故國。

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卷一七,《太祖開寶八年》,第362頁。

⑤ 李昉《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及(徐鉉)歸朝,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于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太祖于是歎息曰:‘忠于所事者乎!汝當’(轉下頁)

心不免保持疑問：汝事我是否如事李氏。因此徐鉉入宋後在直學士院任內制之職，後判尚書都省，始終遠離權力核心，顯然緣於太宗對於南來降臣的不信任^①。然而在李煜已逝的時局下，徐鉉已入仕宋朝多年，寫作時必需站在趙宋官方統一南唐的立場上著墨，不能過分迴護故國；但同時若過分詆毀故主，則於自身“忠義”之名節有損。可見李煜墓志銘的寫作，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

基於《吳王隴西公墓志銘》的文本發生情境：作者、寫作對象、讀者之間，都存在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從而使之成為一篇具有特殊國家意志內涵之墓志銘。目前學界還尚未有任何專論研究此篇，僅偶有考訂李煜死亡情境時參藉此篇作為輔證，或是研究徐鉉詩文時概略性瞻涉是篇^②。該篇墓志的文本建構過程與藝術特徵，以及文本背後折射了怎樣的政治歷史情境皆未能被仔細抉發，實有遺珠之憾。誠如柯慶明指出碑文作為文學之特殊性在於其媒介能夠保存久遠，永久記憶成為其預設的性質和功能；因而其讀者顯然不拘於特定對象，甚至含有感動後世讀者的期待^③。這篇碑實質上也代表了北宋官方對於李煜的評價，以及如何詮釋南唐被征服的當代記憶，從而留下許多值得探尋的疑問：首先宋太宗為何特敕徐鉉為李煜撰碑？實際上恐未必僅如筆記中所言，只因徐鉉其詳知李煜事跡，趙宋官方應有著更深的政治考量。作為降臣身份的徐鉉墓誌中如何詮釋南唐的政治地位問題？徐鉉在墓誌中既懷有故國之思的同時，又有對故國人、事之反省，那麼在寫作故主墓志銘時，如何平衡並表現二者？降臣身份與趙宋政治環境，又如何影響徐鉉對故國興亡歷史過程的認識？是否會對他的撰述意向產生作用？徐鉉是否又會發展出特殊的觀念、論述，用以理解、詮釋故國之興亡？

此外，從宋代文章學、駢文學的角度，《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實也是被歷代文家所注重的名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所撰李煜墓銘，婉嫩有

（接上頁）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厚。”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卷四八，第175頁。

① 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71—72頁。

② 施懿超《沿溯燕、許，風氣初開：徐鉉駢文研究》，《浙江理工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第944—948頁。魏瑋《論徐鉉入宋后文章——兼與高教版〈中國文學史〉商榷》，《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第13—16頁。李振中《徐鉉及其文學考論》，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9頁。

體，文鑒取之。”^①四庫館臣承陳振孫之意，《騎省集》提要云：“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儷偶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②可見後世目錄學家撰寫提要時對此墓志銘的重視，可見茲文影響流傳之廣。同時明清以來幾部重要的駢文選本皆有收錄此篇^③，包括王志堅《四六法海》、王先謙《駢文類纂》、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同時現代學者的論著中對此篇也有所關注，呂思勉、程千帆、張仁青等在論述宋代駢文時，皆敘及徐鉉在宋代駢文史上的一席之地，並皆舉該篇墓志銘為其代表作^④。

陳彭年為徐鉉集做序時稱其“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誄”^⑤，即盛讚其碑誄之情意真切。四庫館臣稱徐鉉：“才高學博，文沿溯燕許，迥然孤秀。”^⑥呂思勉也稱徐鉉之駢文：“雍容大雅，尤為一時之冠。南唐後主之卒也……其文措辭得體，極為當時所稱道。今一循頌之，誠穆然見燕許之遺風也。”^⑦由之可見，徐鉉身處五代之末，駢文寫作卻並不直接繼承晚唐，而是繼承盛唐時的燕許大手筆，這應當與其在南唐及入宋之後臺閣之臣的身份有關。呂思勉說通過這篇，足以“穆然見燕許遺風”，然今之學子若非諳熟唐宋駢文者，恐亦感抽象。因此本文也將以《吳王隴西公墓志銘》為例，分析徐鉉駢文如何“沿溯燕許”，補充宋初駢文史之一隅。

因此本文在開展研究時，力圖還原文本的背景——時代政治背景、徐鉉個人知識學術背景。而後開展文本細部的解讀，考察文本如何反應時代政局、人物風貌。還應注意文史參證比較，墓誌與史傳書寫立場與筆法的差異，認識趙宋官方對李煜（獻國之主）的評價。最後再通過考論徐鉉對“燕許筆法”的承襲，闡揚此篇的寫作藝術。通過以對《墓志銘》的解讀為媒介，在回應前文問題的同時，期以探析趙宋官方對待“降君”之態度，透視南

①（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一七，第 488 頁。

②（清）永瑤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版，卷一五二，第 1305 頁。

③ 惟李兆洛《駢體文鈔》基本只收唐代以前的駢文，故未見。

④ 參見呂思勉《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 頁）；程千帆《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3 頁）；張仁青《中國駢文發展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0—382 頁）。

⑤（宋）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見《全宋文》，第 9 冊，卷一八七，第 228 頁。

⑥（清）永瑤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第 1305 頁。

⑦ 呂思勉《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 頁。

唐降臣入宋後的處境與心態，進而側觀趙宋君臣如何回憶與編寫征服南唐的這一段“歷史記憶”。

二、故國南唐興亡之敘事

不同於一般墓誌以墓主生平為敘事核心，由於李煜南唐國主之特殊身份，《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則以南唐國的興亡作為主體敘事綫索，因此重點即在於徐鉉如何既尊奉大宋統一南唐的正統性，又保持南唐和李煜的尊嚴。本節考察徐鉉如何建構南唐國滅的過程，並比照其與史傳記載有何異同，以此觀照徐鉉在墓志銘中的藝術匠心。

（一）國運與國滅之定調：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

徐鉉開篇沒有像許多宋代散體墓志銘那樣直接書寫人物名諱，而是對李煜、南唐的命運，進行了一個天命性質、蓋棺定論式的終結，在開篇起到了定調作用：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①

在開篇首聯中，注意到徐鉉對於“天命”視角下政權更迭的論述，並非單以李煜為中心：不能守國的“善守者”指的自然是李煜，而徐鉉“聖人無外”的論述則起到了為亡國之君開脫的作用；而“主其祀”的“善繼者”則顯指趙宋君王。實際上李煜墓志銘的寫作，延續國祚興亡之議題，構建了雙綫的敘事的脈絡——主綫即是南唐（李煜），副綫則為趙宋（太祖、太宗）。

也應注意到後代評家，也多從“蓋運曆之所推”角度讚揚徐鉉作文之“有體”，《東軒筆錄》載：“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②

①（宋）徐鉉著，李振中校注《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徐鉉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卷二九，第793頁。

②（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第211頁。

四庫館臣在評騭《宋季三朝政要》時也說該書卷末論宋之亡時：“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①頗可見徐鉉該文推言天命的筆法，對後世之影響。包括在銘文部分，徐鉉也寫道天命與國祚之關係：“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②《毛詩·雲漢》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③，徐鉉在銘文中化用《詩經》之意，隱含了天命不在南唐故有喪亂的敘事模式，而後敘南唐等待著順應天命，甘願作爲附屬固守一方。徐鉉藉用經典中對於“天命”與“國祚”交互影響的論述，將國家動亂、稱臣歸順皆歸之於天。歸結到歷史情境下，也強化趙宋政權合法性。

徐鉉在墓志銘敘事中“推言歷數有盡”，至少有三方面的緣由。首先自然是作爲舊臣追敘故國必須“立言有體”的考量。此時距離南唐國滅僅僅三年，不便過多將亡國罪責歸於舊主，歸之天命則淡化了李煜作爲亡國之君的罪責，起到墓志銘安慰死者之作用。這種舊臣心態不僅見於徐鉉，隨後主入宋之南士亦或多或少有之。太平興國二年（977）鄭文寶撰寫《南唐近事》記錄南唐人物時，僅止於描述他們的風格和品格，卻無意將之放在功過效應的框架中褒貶，一如他對南唐國勢的變化，傾向於認定是天命所定^④。另一方面該文作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也有著迎合趙宋初年強調“天命有歸”政權合法性之政治氛圍之意圖。宋太祖（927—976）去世時，太宗（939—997）以哀弟身份所作的謚冊文寫道：“三靈睠命，兆庶樂推，既應天以順人，乃變家而爲國。……無爲而治，讓德于天，四登園壇，告類上帝。神功聖德，冠絕古今。”^⑤可見在總結太祖功業時，將其承北周禪讓，並一統四海之功業，歸之於上天的顧命，並且也敘述太祖四次南郊祭天，以顯揚政權之合法性。宋太宗即位初期，懷著擔心被質疑得位不正的憂慮，也必須再次強調趙宋王朝與自身的承天受命。根據宋初科舉中太平封禪主題賦頌、臣

①（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第428頁。

②（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5頁。

③（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卷一八，第424頁。

④李卓穎《從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第38卷第2期（2020年6月），第164頁。

⑤（宋）趙光義《太祖謚冊》，（宋）宋綬、（宋）宋敏求編，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九，第38頁。按此文實乃沈倫代筆。

僚進獻升平詩等活動，可以推知自太宗即位初期，已有封禪的計劃^①。期望完成前代皇帝未竟志業，並且更加宣揚趙宋的合法性。同時在降國之主的墓志銘書寫“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等天命因素，也有著爲了接下來的統一事業做宣傳的效果。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四年（979）攻滅北漢，同年移師幽州，意圖北伐契丹奪回燕雲之地，顯示他急於完成太祖留下的統一任務^②，以鞏固王朝的天命正統至無以撼動的地步。最後，可能也與亂世之下弱國臣子，自身國運有數的天命觀有關。徐鉉爲李煜《御製雜說》所撰的序云：“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己，畏天命而側身，靜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遂古，遐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并，鑑謨猷之可久。”^③李煜執政晚期，將自己的著述集結，令徐鉉作序。而在開寶二年，南唐已經向趙宋稱臣，三年後趙宋即發兵全面進攻南唐。因此此時南唐君臣皆已感“國步中艱”，產生了亡國的憂患。徐鉉爲後主的《雜說》作序時，透露出後主著作可以長久流傳，然國運恐怕已經難以長久之意。已然可見徐鉉在南唐的時候，對於國家與君王的命運，已帶有“天命”“時運”思想的悲觀視角。

（二）國勢消長之雙軌敘事與“太平”意識

在歸結天命之後，徐鉉即遵循墓志銘的傳統寫法，將視角投射到作爲墓主的李煜身上。然雖如此，徐鉉卻將南唐與趙宋的國祚相承而書之，呈現雙軌筆法：

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

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以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

① 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第43卷第3期（2013年9月），第491—492頁。

② 蔣復璁《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宋史新探》，臺北：正中書局1966年版，第104—107頁。

③（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534頁。

侯之國，曾何足貴？^①

明人總結唐宋墓志銘的寫作要素有十三：“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②徐鉉此篇《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十三事皆無遺漏。並且由於李煜是昔日國君的緣故，所以本篇墓誌銘異於尋常碑誌文體制的是，在交代李煜的籍貫之後，順而開始敷寫唐代“載祀三百，龜玉淪胥”的國祚興亡，突顯南唐是繼承唐的正統而立國。

在與李煜地位身份類似的吳越王錢俶（929—988）之墓志銘中，錢俶舊臣慎知禮也有對於吳越興國事跡類似的書寫^③。由於吳越國是由唐末杭州本土豪強錢鏐所建立，初以保衛鄉里起兵，而後攻吞叛唐的越州董昌及附近州郡，朱溫篡唐之後首封吳越王，此後便雄據江南。所以在墓志銘中書寫吳越國祚時，只能寫“唐季不嗣”，而錢鏐“式遏寇虐”，顯然就沒有李煜的墓志銘那樣從“皇天眷祐，錫祚于唐”到“宗子維城，蕃衍萬國”那樣得國來得名正言順。

儘管據正史所載，南唐的開國國君李昇本身並非真正是李唐後裔，而是起兵之後自稱為唐憲宗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孫^④。然總歸“宗子維城，蕃衍萬國”對於南唐來說成為被建構的傳統，自然也附著在末代國君李煜的墓志銘中。徐鉉十分強調，南唐的國祚承繼唐代而來，儘管比起“五代”正統地位尚有不如下，但足以作為昔日李唐的別支而得到尊重。以之顯示入宋的南唐舊臣不同於他國降臣，暗示了趙宋征服南唐，也是對於李唐天命的繼承。而後書寫主體從南唐轉入趙宋之興起，“玄貺冥符”便給予了宋承天受

①（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3頁。

②（明）王行：《墓銘舉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2冊，卷一，第一頁上。

③ 慎知禮《大宋……追封秦國王墓誌銘》：“王諱俶，字文德，彭城人也。唐季不嗣，我烈祖武肅王啓五諸侯霸，式遏寇虐，世位以德。我顯考文穆王率十連帥□，□□王家，有志四方，克開厥後，世勳顯矣，盟府存焉。”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冊，卷四二，第65頁。另值得注意的是，為錢俶撰墓誌銘的慎知禮，同樣是吳越國舊臣，與徐鉉之於李煜的身分相當，或說明趙宋在對待“降主”的事跡論定時，有相對一貫的方式。因與本論文論述主旨關涉不大，茲不詳論。《宋史·慎知禮傳》載：“知禮幼好學，年十八，獻書于俶，署校書郎。……太平興國三年，從俶歸朝，授鴻臚卿。”（元）脫脫等：《宋史》，卷二七七，第9445頁。

④（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六二，《南唐世家·李昇》，第767頁。

命的色彩。事實上宋初對於趙宋是承繼哪一朝作為正統，眾臣爭執不一。“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即敘述趙宋繼承後周的正統，可見徐鉉仍是讚成以實際政權的更迭來作為正統的傳遞，即持“數姓相傳”的意見，這也與史傳中他上疏的意見相合^①。而後徐鉉突顯南唐“祇畏天命”而“稟朔”，疊以“魯用天王之禮”等典故，都是為了突顯趙宋建國之後，“寰宇將同”的正統性，也暗含了南唐終將被一統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徐鉉在墓志銘中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的趙宋所併吞，這恐怕與太宗朝時期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有關^②。根據隋唐之封禪經驗，王朝一統是宣稱太平的重要條件^③。而即使未收復燕雲，趙宋君臣也在努力建構“太平”^④。當李煜被俘入京時頗為憂恐，郭守文即寬慰他說：“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可見當時即使一介武將亦知王朝的“太平”理想^⑤。而徐鉉在雍熙元年（984）回顧趙宋國祚時，也努力聲稱趙宋已經達到“一統”“太平”，可見徐鉉對於經營“致太平”也頗用心^⑥；無論這是出於其士人“生預太平”的價值追求，或是為了追逐政治地位而對太宗的迎合。甚至陳彭年總結徐鉉之生平時，也談到如果徐鉉是撰封禪文章的最佳人選^⑦，或許這也代表了徐鉉的“致太平”追求。

① 《宋史·律曆志》：“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為金德。’……常侍徐鉉與百官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弑，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為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元）脫脫等《宋史》，卷七〇，第1596—1597頁。

② 張維玲在《渴望封禪——宋太祖、太宗朝對統治正當性的追求》一章中，詳細論述了趙宋開過君主為了確保政權正當，持續有著期許宣告王朝“致太平”的目標。太祖、太宗朝通過外交軍事手段努力安定邊境，同時君臣配合求治內政，並意圖藉封禪之禮以宣告太平。見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第21—35頁。

③ 《隋書·房彥謙傳》：“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卷六六，第1566頁。

④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九年》載：“二月己亥，群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第364頁。

⑤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太祖太寶九年》，第361頁。

⑥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雍熙元年》徐鉉等人上奏：“天造皇宋……於今二十五年……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天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第576頁。

⑦ 陳彭年在《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其輿議，公即其人。”見《徐鉉集校注》，附錄，第880頁。

因此解釋徐鉉在敘述南唐之將覆時，何以帶有厚重趙宋一統與太平的官方立場。

（三）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南唐國滅過程之書寫

儘管南唐在十五年間“謹藩國之度”，然最終不免遭逢國滅的命運，墓志銘中敘述滅國的經過並試圖進行歸責推因：

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困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①

“祇奉百役，知無不爲”亦正是實筆，除了常貢，李煜在趙宋每次出師征伐他國與吉凶大禮時，也皆會進貢^②，甚至國滅前一年，仍重金資敵^③。因此順承文意而來，首先李煜自己即負“怠於周防”責任，甚至輕而易舉地便被趙宋的使節盧多遜騙去了“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④，導致國土更加被趙宋與吳越國覬覦。

隨後徐鉉將李煜個人的“果於自信”，聯結至國家的淪亡：“西隣起釁，南箕構禍”，“西鄰”乃用《左傳》典，指涉開寶七年（974）八月以降趙宋開始圖謀南唐（江南國）^⑤。然徐鉉在其後的敘事中則將國難的責任大部分都推

①（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793。

②《宋史·南唐世家》載：“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即更以買宴爲名，別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助。”（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七八，第13858頁。

③《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開寶七年）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校注：《南唐書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卷三，第98頁。

④（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太祖開寶六年》，第299頁。

⑤“西鄰”典見《左傳·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一四，第3922頁。“西鄰”用指江南國西邊的強鄰趙宋，此時的江南無以償受西鄰的責難。趙宋圖江南史事見《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七年）八月丁亥，諭吳越伐江南。……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九月癸亥，命曹彬、潘美、曹翰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元）脫脫等《宋史》卷三，第42頁。

給吳越國，“南箕”乃指吳越，源自《毛詩·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鄭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①《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本來就是由於自身被周幽王身邊的小人讒毀，而作詩刺之^②。徐鉉此處也正用此意，顯然即是指吳越國為搬弄讒言之奸邪^③。在墓志銘中徐鉉構建了吳越國覬覦南唐，並且挑撥南唐與趙宋的友好關係的敘事情境。陸游《南唐書》記載：“（甲戌年閏十月）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④。”以至於南唐最終“投杼致慈親之惑”^⑤，失去了趙宋的信任。而後在開寶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李煜赴闕，李煜稱疾不行，即所謂“終後塗山之會”^⑥，兩國外交關係破裂。

南唐、吳越兩國衝突由來已久。實際上在建隆二年，李煜剛剛即位，就上表給宋太祖，說明自己繼承王位同時表示臣服之意，同時還說明了吳越國對南唐的軍事威脅^⑦。可見李煜剛剛即位的時候，唐、越兩國關係不佳，甚至時有邊境衝突，所以李煜在表文中表示了對吳越國挑撥離間的擔憂。李煜輪誠表文中寫道“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而徐鉉在墓志銘中

①（漢）毛亨《巷伯》，《毛詩傳箋》，卷一二，第289頁。

②《巷伯》篇首小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詩末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同前注，第289頁。

③《東軒筆錄》中摘該篇警句，其中此處作“東鄰遭禍，南箕扇疑”。見（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第211頁。按吳越國在南唐之東，此處“東鄰”與“南箕”二句互文，則皆指吳越國，與《徐鉉集》略有不同。而《宋文鑑》亦作“西隣起釁，南箕構禍”，見（宋）呂祖謙編《宋文鑑》卷一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49頁。

④（宋）陸游《後主本紀》，《南唐書校注》，卷三，第117頁。

⑤“投杼”即曾母疑曾參殺人，投杼而走的典故。徐鉉用此典巧妙描述了南唐與趙宋的尊卑關係，以及因謠言而被挑撥離間的外交困境。

⑥事見（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779頁。“塗山之會”見《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以禹比擬趙宋，而處於諸侯地位的南唐未能赴約。（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一四，第3921頁。

⑦《宋史·南唐世家·李煜》：“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為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康，改名煜。……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然所慮者，吳越國隣於弊土，近似深讎，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讐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七八，第13857—13858頁。

也寫道“投杼致慈親之惑”，來說明吳越國煽動破壞南唐與趙宋之間的關係。此處用同樣“投杼”的典故吐露南唐的危險處境，絕非巧合，徐鉉應是看過李煜即位時的上表，甚至也可能當時李煜所上之表即是徐鉉所擬。將亡國歸罪於吳越，同樣淡化了死者李煜的罪責，同時減輕了趙宋作為侵略者的主動性，趙宋只是受到奸邪挑唆並且順天命而行罷了。

但是我們如果回歸到真實的歷史情境中，會發現戰鬭之起，顯然不是像徐鉉所寫那樣，是由於吳越國挑撥離間。從宋太祖對吳越國使節黃夷簡的傳告中可見，趙宋原正有意滅南唐，並且脅迫吳越一同進兵，而且不要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惑^①。當時的吳越恐怕也是在大勢所趨之下，迫不得已一同進兵江南國，吳越的宰相就進言說：“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但是錢俶沒有忤逆趙宋的勇氣^②。以實際歷史情形相參照，更可見徐鉉對於趙宋主動攻滅南唐事實的巧妙粉飾，益見其立言委婉有體。徐鉉作為降臣，不得不將王國責任從趙宋推到吳越國，相對保留了南唐的尊嚴，並維護了趙宋作為侵略者“慈親”之形象。

三、存故主之義——李煜入宋、死亡與蓋棺論定

四庫館臣稱讚徐鉉能夠堅守作為舊臣的道義，對李煜進行客觀的評價：“以視楊維禎作明鼓吹曲，反顏而詆故主者，其心術相去遠矣。”^③在南唐滅國之後，徐鉉還書寫了李煜的入朝、境遇，以及死亡後的影響，安葬的過程等方面，最後還對李煜作為君王之形象進行總體的蓋棺論定。這些無一不是作為降臣身份需要小心謹慎的，並且還涉及趙宋官方對李煜的評價問題。

（一）敘寫太祖、太宗對待李煜之態度

在“終後塗山之會”之後，徐鉉延續前文所採取的雙軌筆法，將敘事視角的主角挪移到趙宋君王身上，從其中也可看到宋太祖和宋太宗對李煜的

①（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太祖開寶七年》，第322頁。

②《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八年》：“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第388頁。

③（清）永瑤等《騎省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第1305頁。

不同態度，先看太祖：“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①可見墓志至此敘事重點主要是側重戰勝者對抗命者的寬容，然仍銘助了李煜曾經爲趙宋出力的“勤王之前效”，並且像光武帝一樣“焚謗”，不追究過去的嫌隙。

在淡化責任的同時，並非否定了李煜違抗天命的事實，所以徐鉉也不忘記揄揚太祖不計前嫌的仁厚“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廣度”。這一點在銘文中也可見互文：“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②此外宋太祖對李煜實際上並不十分尊重，甚至多表現出作爲勝利者的嘲弄。筆記詩話中即記載宋太祖對李煜文學才能的肯定，但同時也正隱含了“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的譏諷^③。或許因此，在墓志銘中關於宋太祖的書寫也就止於“寵錫斯厚”。然而徐鉉用了更多筆墨書寫宋太宗對李煜的優待：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④

可見太宗和太祖對李煜態度的差別，宋太宗不僅給李煜更豐厚的爵祿，甚至還將李煜視作近似清客身份，與之論思文藝。

倘若再結合實際史料，也能更明晰考察太祖、太宗對於“降主”李煜態度之差異，以明晰徐鉉撰墓志之性質。趙宋對李煜的最初處置可以參照

①（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4頁。

②（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5頁。

③《石林燕語》：“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宋）葉夢得《石林燕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卷四，第124頁。《宋詩紀事》引蔡條《西清詩話》云：“藝祖（宋太祖）言：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清）厲鶚《宋詩紀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卷八六《李煜》，第3054頁。

④（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4頁。

《李煜除官制》^①，其中也可見趙宋官方對於攻伐南唐的解釋，對待李煜即是戰勝者的姿態，將李煜歸罪於“輯瑞不趣于朝會”，並且問罪時還頗有抵抗，其實也都是掩飾侵吞的場面話。史傳有載：“（開寶）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②由此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徐鉉在墓志銘書寫中，較為淡化了李煜“拒命”“後至”的責任。從史傳中我們也可以看見，李煜由於“頗聞固拒”，一開始十分惶恐不安，直到趙宋官方安慰他說國家務在致太平，不會多追究責任^③。

參照《長編》中太平興國三年（978）的記載：“（宋太宗）幸崇文院觀書，恣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令縱觀，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至醉而罷。”^④劉鋹是南漢的末代君主，與李煜身份相近。由此也可見太宗對李煜仍帶關心。在歷史情境中，趙光義確實對李煜恩禮有加，違命侯的封號被撤銷，改為隴西郡公。李煜曾向趙光義訴其貧窮，趙光義於其月俸之外，又賜錢三百萬。儘管李煜仍舊處於軟禁之中，但居處似乎頗有幾位樂工來往^⑤。同時李煜死亡時，太宗也確實為之輟朝三日^⑥，至少可見太宗對此事的重視。再結合李煜去世時的政治考量，書寫太宗“撫几興悼，投瓜軫悲”，恐怕也有為準備收復北漢與燕雲失地，作厚待降主之宣傳的政治意圖。同時李煜死亡後，墓志銘所展現出的悲傷的主人公正是趙宋皇帝，而非昔日南唐臣民，也映射出這篇墓志銘的性質，實屬於皇權對於“降主”之觀照。

（二）禮樂仁孝之主：李煜形象之論定

雖然徐鉉在寫作墓志銘時使用了雙軌筆法，不過李煜的主綫地位仍然明顯，墓志銘在敘述南唐貶號獻地的史實之後，接著一段全敘李煜治國有

①（宋）趙匡胤《李煜除官制》：“李煜承累世之遺基，據六朝之故地。朕奄有天下，底定域中。苞茅雖貢於王庭，輯瑞不趣于朝會。泊偏師問罪，銳旅傳城，猶冀懷來，頗聞固拒。爾自貽於悔吝，余豈忘於哀矜。是用盡滌瑕疵，併推恩渥。”收於《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第878頁。

②（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779頁。

③《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九年》：“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患，不欲生見上，（郭）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第361頁。

④（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第423頁。

⑤ 任爽：《南唐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頁。

⑥《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上為輟朝三日。”（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第432頁。

度、且能盡事大之禮：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①

可見李煜稱臣之後，對內“以古道馭民”施行仁政，對外能夠“謹藩國之度”，使得南唐百姓在十五年内度過一段安穩的歲月，事實上肯定了李煜治國的功績。關於李煜以仁政治國的形象建構，徐鉉在南唐時爲李煜寫的《御製雜說序》，恰可與墓志銘對讀：

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縠，理絕名言，默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祇膺眷命，欽若重熙，廣大孝以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方而罪己，體百姓以爲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②

對讀可以發現《御製雜說序》與墓志銘中有許多重合的部分。首先都強調李煜的治國風格源於《尚書》。墓志銘稱“欽若彝倫，率循先志”，語源自《尚書》中“欽若昊天”“彝倫攸敘”“臨君周邦，率循大卞”^③，即謂李煜能夠恭敬地遵循天人之常道。《御製雜說序》中“甘盤就學”，則是《說命》中殷高宗自敘身爲王子時，曾跟隨殷賢臣甘盤，學習先王之道^④。或許可見在宋初五代的君王教育體系中，《尚書》之學占有重要地位。

同時也可見徐鉉重視李煜“孝”形象的建構，並將之與治理國政相聯繫：“廣大孝以厚時風”，“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並且強調重視“烝嘗”之禮^⑤。

①（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3頁。

②（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533—534頁。

③（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依序分見《堯典》，第251頁；《洪範》，第397頁；《顧命》，第512頁。

④《尚書正義》，卷一〇《說命》，第371頁。

⑤《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一三，第346頁。

這可能也與徐鉉的政治思想有關。從徐鉉撰寫與國家祭祀相關的道宮碑銘中,可以看出其重視“孝”對於國政的意義^①。徐鉉認為君主在宗廟祭祀中,讓孝的精神充斥內心,如此君王之作爲將自然合乎道。施政就能實踐堯、舜、周、孔的仁政,並且敦厚時風^②。同時從墓志銘總結人物功業的考量來說,李煜作爲亡國之君没能守住家業,事實上成爲一種不孝,或許因此也影響徐鉉強調孝來補充其人物評價。

在墓志銘散文部分的末尾,用藻麗之辭依照體例交代夫人、兒子名諱情況之後,徐鉉還專門對李煜進行了蓋棺論定式的總體人物形象建構,認為他是有道之君:

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愧歟?^③

首先對李煜容止上的評價,源於漢魏六朝人倫傳統,“威儀”“節度”等儀態要求逐漸成爲士人行止的準則^④。由於李煜實際上治國是不修武備,徐鉉從以儒道治國的角度來切入評價。關於“周孔”之法其用於治國,參見徐鉉《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并序》中的詮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

① 徐鉉《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并序》:“夫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宮館壇墀所以尊道也。爲政者有能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列真之宇以薦誠,其殆庶乎!”見《徐鉉集校注》卷二六,第743頁。徐鉉《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斥內,必道氣應乎外。……用於邦國,則臣節著;施於家庭,則子道光,以之爲政則民從乂,以之薦信則神降福。”見《徐鉉集校注》卷一二,第409頁。

② 張維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5期(2016年11月),第202頁。

③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794頁。

④ 甘懷真:《魏晉時期的安靜觀念——兼論古代威儀觀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1996年11月),第442—445頁。

中，動合於真，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①可見徐鉉認為儒術德政是“道”的外在應用，從逆向推知，李煜能“始終不渝”踐行古聖的禮樂教化，也說明他的“道有所在”，不必因為亡國過分慚愧，體現了墓誌安慰亡者的作用。此外也為李煜降國試圖開解，投降於趙宋也是為民考慮，合乎周孔之道，同時也藉之擡升趙宋形象，趙宋能夠降服有周孔之道的國家，是真正的天命所歸。

徐鉉還用大量篇幅建構李煜具有深厚儒學、文藝修養的形象，在《御製雜說序》中，徐鉉也確實地記載李煜對於墳典濃厚的興趣，並且曾勸說近臣“為學為文”，應當“游先王之道義”，反應了李煜儒學體系下的藝文觀^②。因此在此基礎上，李煜的述作被評價為“窮先王制作之意”。墓誌銘中也常總結人物生平之著述，故而在李煜以儒學治國的背景下，李煜對音樂的興趣與論述，也被涵蓋在儒家的“樂教”之內，所謂“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同時徐鉉可能也有彰顯南唐文化的用意；南唐投降君臣入宋，必然會與北地文化發生齟齬，然而徐鉉入宋後，以其深厚的學養與學術威望，加上性情質直的作風，獲得了李昉、李穆、王祐等北方核心文士的敬重^③。李昉《徐公墓誌銘》也記載了北方文士對徐鉉的品評禮遇，認為他是有道之士^④。因此在南北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徐鉉建構昔日君主者能夠“精究六經，旁綜百氏”的儒學之君風範，那麼其下的南唐的降臣自然也會有著良好的學術修養，以此來提高趙宋君臣眼中南臣的地位。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後期政風頗尚無為及對外和睦。蔣復生指出，宋前期主張因循無為的保守勢力，在太宗時期已初步形成^⑤。可知徐鉉對於李煜“厭兵”“仁義”的人物評價，也具有宋初無為政風的印記。

參讀馬令《南唐書·後主書》載李煜言：“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

①（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六，第743頁。

② 徐鉉《御製雜說序》：“其或萬機暇豫，禁籞晏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為學為文；為學為文，莫若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為古儒也。’”《徐鉉集校注》卷一八，第533—534頁。

③ 張維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第180—181頁。

④ 李昉《東海徐公墓誌銘》：“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冊，卷四八，第175頁。

⑤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8頁。

行也。”^①陸游《南唐書·後主紀》卷末評云：“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②均可證偃王之典^③，實徐鉉之有感而發。通觀誌文此段，始言後主遵古好文，本乎惻隱之性，崇佛厭兵，以致絀於應變，復因躬行仁道，偃文息武，遂致覆亡，結尾繼以反詰：“道有所在，復何愧歟！”則為後主蓋棺之辯白，如謂徐鉉下筆“存故主之義”，當在於此：此“道”非天命運曆之道，而為古仁人之道；惻隱之心，本近乎仁，加以“竺乾”之慈，身死國滅，雖有所憾，終無愧於“求仁得仁”。

最後關於《東軒筆錄》中魏泰載“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④，必須作一解說。根據《韓非子·五蠹》中的記載，徐偃王是被楚國所攻滅^⑤，如果這樣的話，豈不是把北宋比作荆楚蠻夷，為何又得到太宗的讚賞呢？實際上對於偃王事跡，還應參照更廣的詮釋體系，《後漢書·東夷列傳》載：“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⑥由此而知，雖然把李煜比成徐偃王，但下令討伐偃王的是周天子（也即趙宋）。並且根據李賢注引《博物志》，徐偃王雖然可稱為仁義之君，但其實他有著“以己得天瑞”的不軌之心^⑦，所以遭到攻滅似也理所應當，徐鉉正以此暗示了南唐的命運。徐鉉此處既將李煜之仁主形象極盡發揚，又維護了北宋滅唐的正統性與合理性，可謂“立言有體”，令太宗讚歎。

①（宋）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南京：南京出版社 2020 年版，卷五，第 49 頁。

②（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卷三，第 141 頁。

③《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年版，卷一九，第 445 頁。

④（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第 211 頁。

⑤《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第 445 頁。

⑥（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5 版，卷八五，第 2808 頁。

⑦《後漢書·東夷列傳》李賢注引《博物志》曰：“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驪，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走此山。”《後漢書》卷八五，第 2809 頁。

（三）墓志銘“存故主之義”與論定仁主形象之背景

徐鉉在蓋棺論定時，建構李煜仁孝之主的形象，絕非僅取決於其個人的意見態度，也必須經過趙宋官方的首肯。因此墓志銘中對李煜的評斷總結，以及書寫太宗對李煜的優待，甚至要求由徐鉉來寫墓志銘的原因，都應有趙宋官方政治考量下的背景。

首先應與安撫南唐降臣之心有關。實際上徐鉉被宋太宗任命來寫李煜的墓志銘，原因絕非《東軒筆錄》中說“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為詳”那麼簡單。林紓認為此舉亦有試探徐鉉政治認同的意味在內^①。徐鉉和張洎等降臣固然學識淵博，然在趙宋政府的入仕與升遷也與他們的降臣身份有關，趙宋延攬這些人的目的絕非單純的利用他們的才學，同時兼有籠絡南唐諸多士子與官員之人心的目的^②。例如南唐官員入宋後，在東宮擔任職位者較後蜀等國之降臣數量為多，可以看到宋廷對南唐舊臣的重視。宋廷的態度也逐漸由一開始消極防備，改為積極開放，讓降臣及子弟有更多機會參與政權，進而保護家族利益。宋太宗大量提高科舉錄取名額，為使降臣子弟能夠容易科舉及第，改變其身份地位，進而更加認同宋政權^③。

而徐鉉在南唐時已被時人目為“當代文宗”^④，入趙宋後又深得太祖、太宗器重以及當時名流之禮遇^⑤，職是作為南方文士的代表正合適。由徐鉉來撰寫墓志銘，事實上促使南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實，同時藉之體現南臣群體對征服者的順從。官方授意下的墓志銘寫作，在美化趙宋統一大業是天命所歸的同時，也不失對故主的德政予以肯定，同時側面肯定了南唐的士大夫群體，因之也具有了拉攏安撫南方降臣的意味。

① 《京華碧血錄》：“今李煜有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已觸太宗之忌，鉉雖不言，太宗亦決殺之。且鉉之來，太宗亦以試鉉之心，安知左右不無偵伺之人？鉉果一語粉飾如張敞者，立可齏粉。但觀後此李煜之神道碑，必令徐鉉為之，正以觀其向背。”（清）林紓：《林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 冊，第 29 頁。

② 王翠：《北宋前期中央官僚的地域構成》，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第 84 頁。

③ 林煌達：《宋初政權與南方諸國降臣的互動關係》，《東吳歷史學報》第 12 期（2004 年），第 135、142—145 頁。

④ （宋）陳彭年：《江南別錄》，收於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玖）》，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38 頁。

⑤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敘徐鉉入宋後受禮遇之處境：“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瑣闥貂冠，更膺天獎。王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為耆老。”見《徐鉉集校注》，附錄，第 879 頁。

其次也有助於安撫南唐舊地士族百姓。李煜即使投降之後羈北，南唐百姓還是感念其仁政，李煜死後“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①，足見對故主的懷念。在南唐滅亡後，還是有許多南唐故地如江州、吉州、袁州、宣州及閩中等地，仍堅決抵抗^②。即使通過軍事手段取得統治，數十年之內想要安定民心也非易事。可以從一篇南唐故將蔡鵬遺孀的墓志中看到，南唐滅亡之後，南人對南唐仍保留有政治認同。該墓志出土於現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德安縣曾是南唐所轄，開寶七年（974）後納入趙宋版圖。宋太祖趙匡胤以李煜拒絕來朝為辭，出兵討伐南唐。薩夫人丈夫蔡鵬先受李煜之命為江州武備軍都頭，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因抵禦宋軍進攻力竭戰死^③。作者鄭敏作為薩夫人與蔡鵬的女婿，對撰寫去世於趙宋的薩夫人墓志而言，如何記述蔡鵬對南唐的忠心，與當時政治環境無疑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④。實則開寶六年（973）冬，由於趙宋進攻南唐，後主遂棄用趙宋“開寶”年號，改以干支紀年^⑤。然鄭敏在撰寫岳父蔡鵬有關事宜時，並不使用趙宋年號，僅用干支紀年云“丙子年孟夏月二十一日，失利江城”，以此作為對蔡鵬忠心的致敬，可使人體察到撰者鄭敏對於南唐故國的追憶。可見即使是在南唐已經滅國的近五十年後^⑥，士人在回顧往事時，對於南唐仍存有敬意。所以徐鉉（趙宋官方）在撰寫李煜墓志時，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以不失去南唐故臣故民之心。在李煜亡故之後，由南唐士大夫代表徐鉉來撰寫墓誌銘，給予他仁政、仁善、孝節之評價，亦有助於安撫南唐故土。

最後從徐鉉個人的角度而言，昔日君臣之恩義也必然影響到墓志銘書寫。《長編》記載在趙宋對南唐用兵之際，徐鉉前往宋廷求和。恰好長江上游的援兵前來，李煜考慮到徐鉉的人身安全，特令拒止援兵進一步東下。徐鉉備受感動說“要以社稷為計，置臣度外耳”^⑦。此事一方面提醒李煜身為君王“本以惻隱之性”的特徵，也足管窺君臣恩義所在。因此在太宗命令

①（清）吳任臣撰《南唐後主本紀》，《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卷一七，第256頁。

② 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太祖開寶九年》，第36、370、375頁。

③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6冊，卷三二五鄭敏《薩氏夫人墓誌》，第93頁。

④ 全相卿《北宋墓誌碑銘撰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頁。

⑤ 《南唐書校注·後主本紀》：“開寶六年（973）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卷三，第117頁。

⑥ 蔡夫人去世於真宗乾興元年（1022），此碑寫作時間大致在此後不久。

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太祖開寶八年》，第347頁。

徐鉉撰碑時，徐鉉特別強調“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①。徐鉉在《吳王挽詞》中寫道：“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②儘管墓志銘作為面向公領域且需極度審慎的文章，然昔日蒙恩舊臣的情感並非全然被理性所消弭，正如徐鉉所敘“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道有所在，復何愧歟”，而以一种端莊且惋惜的態度來書寫，其情感流露在墓志銘的字裡行間。選擇由徐鉉來撰文，也符合古人對於碑銘文章“情意真切”的價值追求。

四、《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之寫作藝術 ——兼論承燕許遺風

四庫館臣稱徐鉉文章“沿溯燕、許”，呂思勉也稱徐鉉該篇《吳王隴西公墓志銘》：“穆然見燕許之遺風。”^③因此本節希望從文章學之角度，通過考察徐鉉如何承襲張說、蘇頌文風這一文學史議題，以照見徐鉉駢文的文學藝術特徵。

（一）敘事：碑取實錄，不載虛善

張說為故豫州刺史魏叔瑜撰碑，其子魏華正曾以禮答謝，張說覆書曰：“尊豫州府君德業高遠，名言路絕，豈說常詞所堪碑紀？比重奉來旨，力為牽綴，亦不敢假稱虛善，附麗其迹。雖意簡野，文樸陋，不足媚於衆眼；然敢實錄，除棺釀，亦無愧於達旨。”^④張說在信中也說明自己寫作碑誌文的原則“敢實錄”“不敢假稱虛善，附麗其迹”，這在諛碑諛墓盛行的中古社會，殊為難得。因此張說在實際的碑誌文寫作中，也能直接指出事主人生中的不足，例如《右羽林大將軍王氏神道碑》記載碑主：“郭知運推轂河源，握符隴右，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旌麾；不出十年，代總戎之節鉞。”^⑤表面上稱其升

①（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第211頁。

②（宋）徐鉉《徐鉉集校注·補遺》，第835頁。

③ 呂思勉《宋代文學·宋代之駢文》，《文學與文選四種》，第22頁。

④（唐）張說著，熊飛校注《與魏安州書》，《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卷三〇，第1427—1428頁。

⑤（唐）張說《張說集校注》卷一七，第840頁。

遷之速，實則也暗含了其亦乃因人成事，考之史傳，王君奭也恰好是因為郭知運去世，而承襲了其官爵地位^①。而後也敘其自恃勇武，貪功冒進之態：“當時也，躊躇攘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可以力制。即叙者，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為神武非常之主道哉！誓請先拔犬戎，次繫獯鬻。”^②然而可惜的是，最終王君奭在與吐蕃作戰的過程中，遭遇回紇承宗的司馬護輸伏兵被擊殺^③。與其人生結局相參照，張說敘述其“躊躇攘袂”的一段文字，則具有諷刺規箴的意味。在史傳中，王君奭對吐蕃強烈主戰，張說上奏說王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稱其阻撓與吐蕃和平的緣由是：“兩國和好，何以為功。”^④史傳的記載也恰可與碑誌相參，可見張說寫作碑誌“敢實錄”的態度。

前文已論及，徐鉉在歸結南唐滅國原因時，也沒有遮掩李煜的職責，指出他負有“果於自信，怠於周防”的責任。而在墓誌後半，總結李煜一生文藝及治國成就時，徐鉉也直言不諱，將李煜的得失並陳：

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⑤

徐鉉書寫李煜由於過分篤信佛教，以至於過分仁善，導致刑威不加的情形，皆是十分客觀的實筆，史傳皆有以參證，例如《南唐書·浮屠傳》記載當時：“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後主）命禮佛百而捨之。”^⑥並且佞佛同樣導致了損耗國家經濟的情形，即使大臣汪煥死諫，李煜仍是固執地“仍好竺乾之教”，雖然沒有降罪，

① 《舊唐書·王君奭傳》：“王君奭，瓜州常樂人也。初，為郭知運別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版，卷一〇三，第 3191 頁。

② 《唐）張說《張說集校注》卷一七，第 841 頁。

③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〇三《王君奭傳》，第 3192 頁。

④ 參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四六《吐蕃傳》，第 5229 頁。

⑤ 《宋）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 794。

⑥ 《宋）陸游《南唐書校注》，卷一八，《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 136 頁。

然“(煥)言卒不用”^①。由此帶來的連鎖性後果導致“法不勝姦”的用人失當,例如任憑喜好獎用無能的文學之臣湯悅,而罷黜直諫的張洎^②。後主的用人方針也呈現“厭兵之俗”的情形,所重用的幾個人,如皇甫繼勳、劉澄、于布、陳喬、朱令簣等,多為阿諛諂媚、無德無才的新進之徒。然如林仁肇、盧絳、胡則、申屠令堅、潘佑、徐鉉等傑出忠心的文武重臣,卻得不到重用,甚至屢遭排擠打擊^③。而後徐鉉書寫後主“孔明罕應變之略”,在歷史情境中李煜在戰略上也往往表現出保守怯懦的姿態。例如盧絳就曾屢次勸說李煜攻伐吳越國,甚至想出了詐降的計策,但是李後主仍展現出偃武修文的態度說“大朝附庸,安敢加兵”,而沒有聽從他的意見^④。

以上利用史料還原墓誌背後的歷史情境,可見徐鉉在構建墓主形象時,繼承了張說“不敢假稱虛善”的實錄精神。作為舊臣,對故主既不過分粉飾褒揚,也不因為降臣身分而刻意貶損,而以冷靜理性態度對待並書寫,也隱含反省、惋惜、(事後)規箴之意,也是該文千古不朽的緣由之一。

(二) 抒情：騷體句與聯結國運身運

在墓志、神道碑中的銘文部分以騷體句抒情感懷,富於影響力者當屬燕、許的碑文^⑤。徐鉉《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在全篇末尾,以騷句起興,描繪一代君王既葬勒銘的過程:“儼青蓋兮袞袞,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⑥讀之慷慨悽愴,古意徘徊,“遲遲”“徒返”等語蘊含了舊臣對故

① (清)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二五,《南唐·汪煥傳》,第357頁。

② (宋)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卷五,第45頁。

③ 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

④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三年》:“(盧絳)嘗說唐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鄉導,犄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第255頁。

⑤ (唐) 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張說集校注》卷一二,第640—641頁。(唐) 蘇頌:《司農卿劉公神道碑》:“躬清明兮翔膠廓,佩金紫兮富主爵。日冉冉兮亟迴薄,歲崢嶸兮其搖落。吾將追於祖疏兮,噫何為而葬霍。龍山趾兮鳳城端,青靄深兮白露溥。”見(清)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二五七,第2605頁。

⑥ (宋) 徐鉉著《徐鉉集校注》卷二九,頁795。

主的眷戀不捨,但最終也只能以沉痛莊重的姿態相告別,語承《楚辭》中“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的思君傳統而來^①,陳彭年為徐鉉作序時也稱徐鉉繼承屈原風騷^②。同時徐鉉《吳王挽詞》云:“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③與其銘文對讀,可觀騷體文字之抒情性,照見“鉉之忠義”所在,呈現徐鉉入宋之後,已然以君臣身份看待自己與李煜之關係。從語言風格而言,碑銘末尾加入騷體句,以典奧悽婉之風抒發對亡者的挽留與哀悼,也可見對燕、許手筆之繼承。

徐鉉在墓志銘中尤有特色的是,將李煜個人命運籠罩於南唐國運的龐大陰霾之下。當國家衰亡時,李煜個人的命運也隨之轉入低谷,除了其妻、子即葬地的交代,墓志銘絲毫不涉李煜個人生活。這種寫作技法除前文所論諸多政治考量外,也將個人命運置於國運的龐大敘事之下,給讀者帶來充滿歷史感的感慨悲涼閱讀體驗。這種筆法亦其源有自,庾信《思舊銘》實悼羈北而死的梁元帝之孫蕭永。其中痛云:“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邠子無歸。……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④其銘未對蕭永多作形容,而聚焦在國滅人亡的悲慨懷思之中。舊君新逝引起徐鉉故國之悲,然已仕新朝,只能憑藉對故主的悼亡,隱微地流露人性中面對宿命的悲劇意識。這種抒情方式自也影響到後世易代、離亂文學。

(三) 雄辭逸氣,運散入駢

梁肅概覽“唐文三變”之輪廓云:“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⑤《唐文粹》以承此意而推申之,言燕、許二公“雄辭逸氣、丕變習俗”^⑥,更顯示出燕、許在唐文嬗變中承前啓後之功。張說之碑誌使句用詞並不被駢偶所禁錮,而是根據敘事需要,時也化整飭為錯落,運散行之氣入駢。蔡世遠《古文雅正》云:“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為巨手,未能去

① (宋)洪興祖《九辯章句》,《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八,第188頁。

②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見《徐鉉集校注》,附錄,第880頁。

③ 《徐鉉集校注》,補遺二,第835頁。

④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一二,第686—691頁。

⑤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見《全唐文》,卷五一八,第5261頁。

⑥ 姚鉉《唐文粹》序,見《全宋文》,第13冊,卷二六八,第282頁。

排偶之習，然典重矜貴，有兩漢之風味，而無六朝之綺靡，擅名一代不虛也。”^①孫梅《四六叢話·碑誌》云：“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為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乎。”^②可見張說之碑誌雖然仍帶駢偶，然其“詞雄意古”的西漢文風，對韓愈等古文家的碑誌寫作有著重要的影響。徐鉉《墓志銘》亦雜用散句書寫李煜死亡後趙宋以禮葬之的過程，以及李煜個人以周孔之道治國的過程：

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莅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③

亦見繼承燕、許之運散入駢之筆法，雖以駢體為主，但行文遇見需要說明性質的語句時，雖多用四字句保持碑文典雅，然也不刻意求偶對，而是以清簡的散句保持文氣的連貫流宕。有時駢散夾雜，前用駢句，後雜散語繼續闡明事件經過，而顯出雄辭逸氣。

五、結 論

由於李煜南唐國主之特殊身份，《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實際上是以南唐國的興亡作為主體敘事綫索。徐鉉在開篇即定調，南唐被趙宋所征服是天命所歸，既淡化了李煜亡國之君的责任，又迎合了趙宋初年建構“天命所歸”政權合法性之政治氛圍之意圖。在墓志銘中徐鉉構建了吳越國覬覦南唐，並且挑撥南唐與趙宋的友好關係的敘事情境，將國難的责任大部分都

①（清）蔡世遠《古文雅正》，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5 年版，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第 1525 冊，卷七，第 8 下。

②（清）孫梅《四六叢話》，收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冊，卷一八，第 4615 頁。

③（宋）徐鉉《徐鉉集校注》，卷二九，第 794—795 頁。

推給吳越國，也有助於減輕死者李煜的罪責，同時弱化了趙宋作為侵略者的主動性。然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趙宋原正有意滅南唐，並且脅迫吳越一同進兵。可見徐鉉在墓志銘中，對於趙宋主動攻滅南唐事實的巧妙粉飾，益見其立言委婉有體。而徐鉉在墓志銘中著重敘述南唐被代表“正統”的趙宋所吞併，也源於其有意配合太宗朝對“太平”這一統治目標的追求。

徐鉉在對李煜形象與功業進行蓋棺論定時，敘述李煜對內“以古道馭民”施行仁政，肯定了李煜治國的功績。著重李煜“孝”形象的建構，並將之與治理國政相聯繫，這與徐鉉的政治思想有關。還突顯李煜有著良好的儒學修養，以周孔之道治國，並且根據李煜不渝地踐行古聖的禮樂教化，推知其“道有所在”。徐鉉還用大量篇幅建構李煜具有深厚儒學、文藝修養的形象，隱含彰顯南唐文化，以提升入宋南臣形象地位的用意。即使是在史傳中，往往也難逃“勝利者傳統”，往往敘述失敗的國君“不行仁政”，百姓生活不佳，以突顯勝利之師的正義性。徐鉉對於李煜的仁政功績能夠以實筆書之，不加毀飾，殊為難能。該墓志銘由徐鉉來寫作，並建構李煜仁孝之主的形象，必然有著趙宋官方政治考量下的背景。由徐鉉的墓志銘寫作活動，促使降臣群體再次“認同”南唐被趙宋征服的歷史事實，藉之體現南臣群體對於征服者的順從。墓志銘中對故主的德政予以肯定，也側面肯定了南唐的士大夫群體，附帶拉攏安撫南方降臣的意味，亦有助於安撫南唐故土，以不失去南唐故臣故民之心。墓志銘中宋太祖和宋太宗對李煜的態度有所不同：太祖重點主要是側重戰勝者對抗命者的寬容；而用更多筆墨書寫宋太宗對李煜的優待，同時書寫李煜去世時“撫几興悼”，也有為準備收復北漢與燕雲失地，作後代降主之宣傳的政治意圖。

就此篇文學技法與藝術特徵而言，徐鉉繼承張說“碑取實錄”的寫作要旨，並未一味褒揚墓主，在歸結南唐滅國原因時，指出李煜過度仁慈佞佛，以至於綱紀紊亂、用人失當，同時“怠於周防”，對於南唐國覆應負責任。以冷靜理性態度對待並書寫，也隱含反省、惋惜、規箴之意。在墓志銘全篇末尾，徐鉉以八句騷體描述李煜既葬勒銘的過程，以典奧淒婉之風抒發對亡者的挽留與哀悼，且語承《楚辭》的思君傳統。徐鉉還將李煜個人命運與南唐國運緊密聯繫，營造悲劇感與歷史感的閱讀美學。徐鉉也學習“燕許”運散入駢之風格，雜用散句書寫李煜的儒學修養及死後的禮葬過程。雖多用四字句保持碑文典雅，然也不刻意求偶對，有時前用駢句，後雜散語繼續闡明事件經過，而顯出雄辭逸氣。

沈松勤考辨在北宋前中期，徐鉉、楊億、晏殊、歐陽修前後四代有明顯前後傳承關係，各為文壇盟主^①。晁說之也指出北宋文化盛景實從江南而來，並舉徐、楊、晏、歐等為例^②。張興武也指出徐鉉、楊億、歐陽修三者對於文章之革新，是南文北進的三個階段性標誌^③。孫梅《四六叢話》在概述駢體宋代碑誌時，即推徐鉉與晏殊為宋碑冠冕，共同具有“辭尚體要，文本性情”以及“忠厚”的特質^④，可推論晏殊碑文或亦承徐鉉筆法而來。綜上可見徐鉉對於北宋文壇與文章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李煜墓志銘作為其代表作，可據此窺見徐鉉文章具有莊重典雅、溫潤含情的敘事抒情風格，同時又能順應時代政治潮流，符合朝野政治需求，展現家國關懷。以本文為媒介，通過對徐鉉駢文的價值重新體認，藉之補充文學史中宋初駢文的地位與文學史影響，明晰北宋廟堂文章倡古道、守法度、語典雅、重氣格的文學風尚，在宋初徐鉉身上淵源有自。

（作者單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

① 沈松勤《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壇演變歷程》，《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第63頁。

② 《曲洧舊聞》記載晁說之所論：“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侄以詞章進……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宋）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卷一，第97頁。

③ 張興武《宋初百年文學復興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3頁。

④ 孫梅云：“徐騎省撰南唐後主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之碑，塗改生民，而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清）孫梅：《四六叢話》，收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5冊，卷一八，第4615頁。

**Writ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a Fallen State:
Narratives of Rise and Fall in Xu Xuan's
“Inscription on the Tombstone of King Wu
of Longxi” and Comments on Li Yu**

Zhang Xincheng

This paper examines tomb inscriptions as a medium to analyze the Zhao Song dynasty's official attitude toward defeated monarchs, specifically to illuminate the conditions and mindsets of Southern Tang officials after their submission to the Song dynasty. It further observes how the Zhao Song rulers and ministers recalled and 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ir conquest of Southern Tang and interpret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onquered.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complex and tense political background behind Xu Xuan's commission by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to compose the tomb inscription for Li Yu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It reveals that Xu Xuan, while adhering to the Zhao Song dynasty's official stance of rightful unification, maintained a sense of loyalty to his former ruler, conferring special literary and historiographical value to his work. Xu Xuan constructed a narrative that interpreted the fall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as an act of divine will, thus mitigating Li Yu's responsibility as the monarch of a fallen state while extolling the Song Dynasty's legitimacy as divinely ordained. Xu also whitewashed the Song dynasty's aggressive invasion and shifted the blame for the state's collapse onto Wuyue, which had disrup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Zhao Song and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Emphasizing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s absorption by the orthodox Zhao Song dynasty stemmed from Emperor Taizong's pursuit of the ruling objective of “great peace” (*taiping* 太平). In his final evaluation of Li Yu's character and accomplishments, Xu Xuan highlighted Li Yu's governance through benevolence and careful maintenance of vassal relations, thereby prompting the group of surrendered officials to re-acknowledge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he Southern Tang dyansty's conquest by the Zhao So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Yan Xu” 燕許 stele’s tradition of factual recording, Xu Xuan objectively pointed out the flaws in Li Yu’s rule and implied a reflective critique. In the inscription, Xu Xuan depicts Li Yu’s entombment process in a sorrowful, elegiac Sao style, which reveals a commanding and free-spirited eloquence. Xu Xuan’s impact on the Northern Song literary scene was profound; re-evaluating his ornate prose illuminates that the literary trends in the Northern Song court—advocating for the ancient way, adherence to rules, and emphasis on vigor and style—originate from the early Song figure Xu Xuan.

Keywords: Li Yu, Xu Xuan, Southern Tang dynasty, tomb inscription, ornate prose in the Song dynasty

徵引書目

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Kong Anguo, Kong Yingda. *Shangshu zhengyi*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reprint from the Jiangxi Nanchang Fu Xue Kan ben of the 20th year of Qing Jiaqing.
2. 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Mao Heng, Zheng Xuan, Lu Deming. *Maoshi chuanjian* (*Commentary to the Mao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8.
3. 王行:《墓銘舉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Wang Xing. *Muming juli* (*Examples of Epitaphs*).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reprint from the Wenyan Ge Siku Quanshu.
4. 仝相卿:《北宋墓誌碑銘撰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Tong Xiangqing. *Beisong muzhi beiming zhuanhu yanjiu* (*A Study on the Writing of Northern Song Tombstones and Inscriptio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9.
5.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Yong Rong et al.. *Siku quanshu zongmu* (*General Catalog of the Siku Quan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5.
6. 甘懷真:《魏晉時期的安靜觀念——兼論古代威儀觀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1996年11月),頁407—463。Huai-Chen Kan. “Weijin shiqi de anjing guanlian — jianlun gudai weiyiguan de fazhan” (*The Concept of Quietude of the Wei-Chin Period: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oncept of Dignified Manners*). *Taida lishi xuebao* (*Historical Inquiry*) 20 (Nov. 1996): pp. 407 – 463.
7. 任爽:《南唐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Ren Shuang. *Nan Tang Shi*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Changchun: Dongbe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5.
8. 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Zhu Bian. *Qu wei jiuwen* (*Old Stories of Qu We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2.
9. 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Wu Renchen. *Shiguo chunqiu*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Ten Kingdom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0.
10. 呂思勉:《文學與文選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Lu Simian. *Wenxue yu wenxuan sizhong* (*Four Books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election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11.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Song Shou, Song Minqiu. *Song dazhaoling ji* (*Collection of Imperial Edicts of the Song Dynasty*). Edited by Si Yiz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2.
12. 李卓穎:《從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38卷第2期(2020年6月),頁133—170。Li Jhuo-ying. “Cong weizhu tianming dao zhuijiu zeren — Nantang jiuchen ru song zhihou de lishi renzhi yu shuxie”

- (From Destiny to Responsibility: A Former Official's W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Tang). *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38, 2 (Jun 2020): pp. 133–170.
1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Li Tao.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Long Draft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That Aid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4.
 14. 杜文玉:《南唐史略》,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Du Wenyu. *Nan tang shilu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Shaanxi: Renmin Jiaoyu Chubanshe, 2001.
 15.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Du Yu, Kong Yingda. *Chunqiu zuozhuan zhushu* (Annotation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ith Commentar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reprint from the Jiangxi Nanchang Fu Xue Kan ben of the 20th year of Qing Jiaqing.
 16. 沈松勤:《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壇演變歷程》,《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2008年7月),頁61—70。Shen Songqin. “Cong nanbei duizhi dao nanbei ronghe — Songchu bainian wentan yanbian licheng” (From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 to North-South Integration —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erary World i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Song Dynasty). *Wenxue pinglun* (Literary Review) 4 (Jul. 2008): pp. 61–70.
 17. 林紓:《林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Lin Shu. *Lin Shu Ji* (Collection of Lin Shu).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2020.
 18. 林煌達:《宋初政權與南方諸國降臣的互動關係》,《東吳歷史學報》第12期(2004年12月),頁129—157。Huang-ta Lin. “Songchu zhengquan yu nanfang zhuguo jiangchen de hudong guanxi”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Song Dynastic Government and the Officials of the Former Southern Kingdoms). *Dongwu lishi xuebao* (Soochow Journal of History) 12 (Dec. 2004): pp. 129–157.
 19.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版。Ko Ching-ming. *Gudian zhongguo shiyong wenlei meixue* (Aesthetics of Practical Literary Genres in Classical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Hong Xingzu. *Chuci buzhu*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Songs of C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3.
 21.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Sun Xidan. *Liji jijie*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9.
 22. 孫梅:《四六叢話》,收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Sun Mei; *Si liu cong hua* (Discussions on parallel prose). in Wang Shuizhao (Ed.). *Lidai wenhua* (Discussions on Prose throughout the Dynast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徐鉉,李振中校注:《徐鉉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Xu Xuan. *Xu Xuan ji jiaozhu* (Collected Works of Xu Xuan with Annotations). Annotated by Li Zhenzhong.

-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6.
24. 馬令:《南唐書》,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年版。Ma Ling. *Nan tang shu* (*Book of Southern Tang*). Nanjing: Nanjing Chubanshe, 2020.
25. 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第43卷第3期,(2013年9月),頁481—524。Wei-Ling Chang. “Zhong taizong, zhenzong chao de zhi taiping yi fengshan” (To Achieve Great Peace: Song Taizong to Zhenzong’s “Fengshan” Activities). *Qinghua Xuebao*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3.3 (Sep. 2013): pp. 481—524.
26. 張維玲:《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5期(2016年11月),頁175—217。Wei-Ling Chang. “Songchu nanbei wenshi de hudong yu nanfang wenshi de jueqi — Jujiao yu Xu Xuan ji qi houxue de kaocha” (The Interaction of North and South Literati and the Rising of South Literati During the Early Song: An Investigation on Xu Xuan and His Disciples). *Taida wenshizhe xuebao* (*Humanitas Taiwanica*) 85 (Nov. 2016): pp. 175—217.
27. 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版。Wei-Ling Chang. *Cong tianshu shidai dao guwen yundong — Bei song qianqi de zhengzhi guocheng* (*From the “Heavenly Texts” Period to the Guwen Movement: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21.
28. 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Zhang Shuo. *Zhang Shuo ji jiaozhu*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Yue with Annotations*). Annotated by Xiong Fe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3.
29. 張興武:《宋初百年文學復興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Zhang Xingwu. *Songchu bainian wenxue fuxing de licheng*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Revival i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30.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Tuo Tuo et al..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5.
31.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Chen Zhensun. *Zhizhai shulu jieti* (*Explan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Zhi Zhai Catalogue*).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32. 陳彭年:《江南別錄》,收於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Chen Pengnian. *Jiangnan bielu* (*Records of Jiangnan*), in Fu Xuancong et al. (Eds.). *Wudai shishu huibian, jiu*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of the Five Dynasties, No.9*), Hangzhou: Hangzhou Chubanshe, 2004.
33. 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校注:《南唐書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Lu You. *Nan tang shu jiaozhu*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Book of Southern Tang*). Annotated by Qian Zhonglian and Ma Yazhong. Hangzhou: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5.
34.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年版。Zeng Zaozhuang and Liu Lin (Eds.). *Quan song wen (The Complete Prose of Song)*.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2006.
35. 葉夢得:《石林燕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Ye Mengde. *Shi lin yan yu (Gossip from the Stone Forest)*.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19.
36.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Dong Gao et al. (Eds.). *Quan tang wen (Complete Prose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3.
37.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Liu Xu et al.. *Jiu tang shu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5.
38.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Liu Fusheng. *Bei Song Zhongqi ruxue fuxing yundong (The Revival Move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Taipei: Wenjin Chubanshe, 1991.
39. 厲鶚:《宋詩紀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Li E. *Song shi jishi (Historical Records of Song Dynasty Poetry)*. Hangzhou: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9.
40. 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Ouyang Xiu. *Xin wudai shi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notated by Xu Wud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4.
41. 蔡世遠:《古文雅正》,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Cai Shiyuan. *Guwen yazheng (Anthology of Elegant and Proper Ancient Prose)*. Hangzhou: Hangzhou Chubanshe, 2015, reprint from the Wenlan Ge Siku Quanshu edition.
42. 蔣復璁:《宋史新探》,臺北:正中書局,1966年版。Chiang Fu-tsung. *Song shi xintan (New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66.
43. 魏泰撰,燕永成整理:《東軒筆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Wei Ta. *Dongxuan bilu (Records from Dongxuan Studio)*. Compiled by Yan Yongcheng.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19.